

謹呈

主座並乞指謬

職
楊鴻烈

十一月二日

213

33

日關係五講



中日關係五講

楊鴻烈

目錄

- 第一講 中日兩國在地理歷史文化上的密切關係
- 第二講 中日關係的根本觀念
- 第三講 中日基本條約的闡釋
- 第四講 中日合作的基礎
- 第五講 中日合作與東亞新秩序建設的前途



中日關係五講

中日關係五講

第一講 中日兩國在地理歷史文化上的密切關係

中日兩國的關係，無論從地理上歷史上文化上來說，都是再密切沒有的了，所以內藤虎次郎博士就說

過這樣的一句話：「日本民族未與中國文化接觸以前是一鍋豆漿，中國文化就像輸水一樣，日本民族和中國文化一接觸就成了豆腐。」據地理學家的考察，中國與朝鮮安南都是「壤境相接」，往來至為便利，惟有對於日本雖只隔了一個大海，在航海術未發達的時代，彼此要想交通，頗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惟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士却往往利用日本海的左旋回流，由朝鮮半島漂渡到日本的山陰地方，以灌輸中國文化。中山久四郎博士所著「中國史籍上之日本史」見「大日本史講座」第十七卷曾根據「史記」的「五帝本紀」及「尚書」的「禹貢」和「帝王世紀」諸書主張中日兩國的交通遠在虞舜時代，按這些書籍都是後人所偽作的，故不可相信。此外時代說得較晚一點的如內藤虎次郎博士所著的「增訂日本文化史研究」一書則謂在中國的戰國末年，日本始接受中國的文化，此說比較的近於事實。不過在日本方面，彼時殊無法可以利用日本海的左旋回流，所以不得不從北九州經過對馬壹岐至朝鮮半島，而更至中國，凡「前後漢書」「魏志」「晉書」「宋書」所記載日本使臣來華的路線，大概總不能離開此一條路徑。在這個中國民族發生大



異動的時代，除掉秦朝的徐福所率領的三千人赴日而外，還有弓月君（融通王秦始皇的後裔）所率領的一百二十縣的人民移居日本，以及如日本河村壽重氏與李玉文氏合著的「漢和民族之關係」一書所說：「……漢室傾覆後，曹魏亦食其果，遭司馬氏之篡，國號曰晉，晉太康十年五月朔日（爲西紀二八九年）有漢太祖高皇帝劉邦之後胤，孝靈帝嫡裔皇曾孫阿知王者（名宏）率其子都賀王及漢朝之大臣後數姓氏，共男女人口二千四十名，由帶方郡東渡赴日，飄蕩四月之久，於日本應神天皇二十年己酉九月五日而正式歸化於友邦，其經過則有中日史乘可證。夫以男女二千餘口之衆，而經千六百餘年之久，息息相傳，代代相續，繁衍殖生，至今已衆達八百餘萬，且在友邦各地，多留有歷史之痕跡足供考據。此項史實既有歷史之根據，復有漢劉氏家廟等，且曾成立同族會尤信而足徵。况自阿知王歸化之後，婚姻互通，是大和民族與大漢民族之血統早已混合矣，若謂之爲弟兄手足之邦，自不得謂爲虛誣。……」（參看原書第七、八、九四至一五七諸頁）這樣看來，那時中國的移民對於日本實在有過極爲密切的關係。嗣後到了隋代，文帝把幾百年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統一起來，其強大的武力與高度的文化自然使滿洲朝鮮日本等與其周圍鄰近的民族望風披靡，其時日本國民因生產有相當的進步，發生村落膨脹，人民移動，土地漸成私有的現象，所以正想廢除從古昔以來由民族聯合而成的國家的脆弱的組織，期望形成如當時中國那樣的中央集權的鞏固國家，而一瞰世罕見」的聖德太子，又更能「上體天心，下察民意」，深慕中國的燦爛文化，澈底實行親華的政策，特派「遣隋使」，中國的雄才大略的隋煬帝，亦遣使者來日報聘，這樣中日的來往交通因之大盛！於是中國的

文化乃得充分的輸入日本，日本在官制，學制，田制，稅制，律令，文學，史籍，曆法，陰陽，思想，音樂，建築，工藝，美術字畫以及佛教各方面亦隨處均一意以中國爲模範，這些移植文化的工作並不因隋唐兩朝的遞嬗而稍有停頓，乃自入唐以來而其盛況反爲前古所未嘗夢見！就是現在我們旅行遊覽過日本的京都奈良一帶地方的人，也還可以親眼看見那許多的寺院，殿陵，與城池園苑，不禁令人追想到隋唐時代文物的氣魄體製與日本當時熱烈的接受中國文化的一般情形。若更得到日本政府的特別優待與許可能參拜一下如奈良正倉院那些爲「平民足跡所不能到」的地方，就可發現彼處所收藏我國唐朝的樂器，（如七絃琴，阮咸——卽四絃琴——，五絃琵琶，笙笛等），博具，藥品，寶刀，銅鏡，官尺，筆墨，紙張，銅薰爐，寫經，染織……等數也不數清的古代遺物，使我們感歎爲什麼在東洋文化本宗的中國裏面像這樣「琳瑯滿目，美不勝收」的祖宗手澤遠遠不及鄰家所保存的爲既多而又完整呢！其餘又如在我國早已失傳的唐樂現在也仍然包容於日本宮內省的「雅樂部」裏的「壹越調」，「平調」，「雙調」，「黃鐘調」，「盤涉調」，「大涉調」等六調之中，這樣真成爲千古的絕響了。記得某氏曾說：「日本的風俗習慣都與從前的中國相同，如日本用蓆子，中國本來也是「席地而坐」。還有中國有名的逸話梁鴻孟光夫婦倆是很重禮節的，孟光非常恭敬自己的丈夫，卽所謂「舉案齊眉」，現在中國的桌子那麼大，怎麼能夠「舉案齊眉」？這在嚴登的中國人看來，是很難解釋的，但現在到日本一看，便立刻可以了解，像下女送飯來的時候，的確是「舉案齊眉」。……又譬如日本人用的禪，是以一匹布來纏繞着下體的，其實就是中國古時的「犢鼻褌」，因爲形式和沒有穿鼻孔

的小牛的鼻套繩相像。……」其實除這幾樁事物而外，別的還是「更僕難數」呢，因此，無怪乎到了明朝的初年，日本的使臣嗜哩嘛哈親見中國的皇帝還吟詩一首道：

「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

又如近人松平忠久氏也曾講演過：

「……直接由中國或者是經過中國大宗傳來的是漢字儒教、佛教、藝術、制度等，還有在唐朝時代，不少日本人留學到中國，就中僧侶爲研究佛教到長安留學，回國之後，開各種宗派，使日本的佛教隆盛一世，由印度創生的佛教的僧侶，把中國的文物制度，移轉到日本，這是一種很有趣味的現象。如此東亞的文化，就中儒教或佛教等代表文化，在中國的唐朝時代流進日本，而刺激日本文化，但是都被日本的國體鞏化而獨自的進步發展。所以常常在印度，或中國早已破壞消滅了的文化，到現在在日本仍然存在。

譬如「禪」是一個明證，禪宗是佛教的一派，達摩開宗教，到六祖慧能的時代，分爲南北，（六祖就是在現在的廣州六榕寺修法，我還記着他在韶關上佛的事）而漸漸發展，到現在臨濟禪各地還能看見。不過是像在日本爲修養精神而參禪的人很少，現在在日本，不少學生官民禪寺到參禪粗衣粗食，熱心磨鍊精神。他們叫禪宗不說法師出題目，像「本來的面目是甚麼！」「一隻手的聲音是甚麼？」竟想進入「無我無私」，無念無想之心境」，努力修養。如此在日本實際社會中，有意義的仍然存在，但是

在中國，可不能看見這種現象。

在過去時代，由日本留學中國的僧侶中，有名的就是空海，他在中國滯留十年，回國之後，在高野山開真言宗。在高野山還有許多大伽藍，誇示佛教的隆盛，而空海二字，連小學生也都知道。最近褚外交部長，也把空海的銅像，由日本帶回，安置在中日文化協會內，但是這空海最吃苦修養的長安古石佛寺，現在成了小學校了，我十幾年以前，旅行陝西省西安的時候，正碰見一個日本僧侶尋找這古石佛寺，我也給他幫忙，到底是找不着，後來一個星期之後，才好容易發見這古石佛寺，在西安郊外十幾里的某一個村莊裏成了小學校了。發見這個事實的時候，我對於中國佛教的衰弱，覺着非常寂寞，另外還有不少像插花兒，（花道）呂茶，（茶道）下棋等，也是在中國已經衰弱，而在日本倒是很流行。……」

再說自隋唐以來，中日兩國的「國際關係」與彼此人民的「私人關係」也真只有「潔白無疵」四個字可以形容，這裏有詩爲證：試看唐玄宗的「御製給遣唐使藤原清和等」的詩句如下：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念余懷義遠，於爾畏途遙。漲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颿；因驚彼君子，王化速昭昭。」

其時日本留學學生最著成績的如阿部仲磨，差不多完全同化中國，不祇在飲食起居衣服等方面而已，甚至把原來的日本姓名也都廢掉，改稱晁衡，他最富於感情，非常留戀中國，作詩自述：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伏奏違金闕，駢駢去玉津；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隣；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有唐詩人如王維的詩集裏也收錄得有「送祕書監晁衡還日本國」，可惜中日雖相隔不過僅「一衣帶水」之地，而在航空術未發達以前，沿途却是很多荆棘，所以阿部仲磨在海上因遭遇颶風就被漂流到安南去，一時謠傳他已被難，累得詩仙李太白還作了一首「哭晁卿行」說：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濤蓬壺；明月不歸沈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他們的這種崇高純潔的友誼，豈有點絲毫的「國家界限」在其中作梗？又如那位爲日本一般民衆所頂禮崇拜而上面已經提及的「入唐學法沙門」的弘法大師空海，在他離唐回日的時候，也有如以下所舉的人作詩，以壯他的行色：

朱千乘的「送日本國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貢方物而歸海東詩敘」，「滄溟無垠，極不可究，海外緇侶，朝宗我唐，即日本三藏空海上人也，能梵書，工八體，善俱舍，精三乘，去秋而來，今春而往，反掌雲水，扶桑夢中，他方異人，故國羅漢，蓋乎凡聖，不可以測識，亦不可以智知；勾踐相遇，對江問程，那堪此情？離思增遠，願珍重！願珍重！……」

古涼苑休公，談真說苦空；應傳六祖後，遠化島夷中。去歲朝秦闕，今春赴海東；威儀易舊體，文字冠儒宗。留學幽微旨，去關護法崇；凌波無際礙，振錫路何窮；水宿鳴金磬，雲行侍玉童；承恩見明

主，偏沐僧家風。」

弘法大師也有「留別青龍寺義模開梨」的詩說

「同法同門喜遇深，隨空白霧忽歸岑；一生一別難再見，非夢思中數數尋。」

又有「在唐觀起法和尙小山」的詩說：

「看竹看花本國春，人聲鳥語漢家新；見君庭際小山色，還識君情不染塵。」

這一切的一切都可實證在隋唐時代中日兩國無論朝野僧俗，都是「氣味相投」，「親愛逾恆」的。此後如趙宋時中國和日本的交通雖不及隋唐時那樣的「往來頻繁」，但兩國僧人頗能努力灌輸宋朝的新文化於日本，如禪宗的樣式，佛像的修鑄，印刷的法術，以及醫學歷法，美術工藝，茶道等等，但其中最為顯著的還是一般鎌倉幕府的武士們極端重視中國的「禪宗」，以之為精神上惟一的修養，原來從北條時賴做了「執權」，就招聘宋朝僧人關溪道隆營造建長寺，竭力提唱以「樸素寡慾」為宗旨的禪宗，實行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主義，而且叢林的規矩又很嚴正，素來「崇尚禮節」，「講究義氣」的鎌倉武士們當然非常崇信歡迎。（當時禪宗以外的佛教徒便都免不了有「放縱私慾」的腐敗墮落的行為。）他們既相信「若能空一切念，一切皆無惱，一切皆無怖，猶如着重甲，入諸魔賊陣，魔賊雖衆多，不被魔賊害，掉臂魔賊中，魔賊皆降伏」的話，所以很能看破生死的關頭，不致慌亂失措。後來在元世祖十七八年間大舉派兵遠征日本的時候，「執權」北條時宗明知蒙古的強大，日本實非其敵，但因為平時篤信禪宗，於是

「從容不迫」的應付敵人，元兵卒爲颶風所覆滅，在時宗死後的三週年作忌法的時候，祖元和尙還在稱讚他說：「弘安（後宇多天皇年號）四年，廢兵百萬在博多，（時宗）略不經意，但每月請老僧與諸僧下語，以法喜禪悅自樂，後果佛天響應，家國泰然，奇哉有此力量，此亦佛法中再來人也。」這樣可見日本軍人很喜歡接近中國禪宗的僧侶，而日本「武士道」的成立，所蒙中國僧人的影響實在不算微小。至於宋人對日本的認識也較前大有進步，歐陽修所作的「日本刀歌」有說：

「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艸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朝貢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往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猶存。」

日本坂本箕山氏曾列舉宋日的關係如下：

「：在宋朝時，船舶渡至日本的有七十餘次，但無使節往還。所來的都是專事商業上的交易。商船皆駛入博多灣，寄宿於博多的鴻臚館，由警固所呈報入港事於太宰府，再由太宰府轉稟京都朝廷。當時貿易，主要進出口貨是：

進口貨：錦，綾，香料，藥，茶具，文具，書籍。

出口貨：棉，綢，布，沙金，水銀，扇，刀劍。

因爲當時平民採取積極政策，所以商船出入頻繁，日本商船赴宋者很多，而僧侶趁便亦就乘商船入宋

了。

北宋時入宋的日人

蔚然，成算，祚登，嘉圓，源信，賴緣，快宗，惟觀，心賢，仲回，成尋。

南宋時入宋的日人

重源，榮西，覺河，全慶，俊仍，安秀，長賀，良祐，淨素，辨圓，敬念，覺心，普門，惠雲，爾然，惠曉，榮尊，法心，淇海，道祐，了心，智鏡，僧豪，濟寶，淨照，義尹，惟僊，紹明，真照，義價，覺儀，觀明，上昭，道玄，惠雲，圓範，德詮，宏雲，周海，智侃，順空，靈林，息齊，勝辨，源心，常禪房，明心，禪忍，無傳，祖元，寂照。

移入日本的宋代文化

宗教建築

禪宗傳來所起的影響，使日本的建築發生變化，大門，迴廊等皆效法宋式，這是重源，辨圓，道隆，義價等高僧移入的。

書籍印刷

文選，自氏文具，唐版的玉篇，五代記，唐書；東坡指導圖，太平御覽，宋版的大學，中庸，論孟集註，朱子的四書及其他，合共二百五十六卷，宋版的大藏經等皆輸入日本，翻刻濫觴，因由於印刷術劃一新紀元。

醫學及曆學

僧榮西，在宋習醫術，著喫茶養生記，木下道正自宋攜歸解毒藥製法；宋醫朝元坊且渡日爲北修時賴的侍醫；而辨圓（聖一國師）復自宋攜歸魏代的家藏方十一冊，該書玩藏於宮內省 賀茂得憲因受宋代曆學的影響，乃分別曆與天文，著成曆書。

美術工藝

繪畫亦受宋代的影響，色彩轉趨淡薄，用筆巧妙，日本之宋畫及南宋畫的畫風即起於此時肖像畫亦很風行，彫刻鑄造佛像亦發達，而陶器和織物的製造術亦都傳來，博多織綾織，即依照宋代傳來的製法織造。

種茶與茶道

茶食在奈良朝時代即已移入，但專供藥用而已。當鎌倉時代榮西自宋帶回茶經，種茶於肥前的菅振山。泊後明惠上人復於京都梅尾山種茶，於是茶道茶會遂盛行起來。……

元朝鑒於以「武力」使日本「屈膝」的困難，故在渡海東征最後失敗以後，就改用寬大的態度對待日本，

於是元日兩國的商舶仍照舊「絡繹不絕」的往來，文化的輸入從未嘗一度中斷過。坂本箕山氏很概括的說：元朝帝國雖有意征服日本，後覺悟目的難達，即曉諭國民，令與日本通商。元的貿易港有慶元，泉州，廣州之外，日本的貿易港則有博多。自博多啓碇，利用西南風，約十日即可抵達慶元。日本商船最初赴慶元者，是在後宇多天皇弘安二年。當時的貿易品，主要者計：

進口貨：綾，錦，茶，香藥，銅錢，書籍，文具，什器。

出口貨：硫黃，銅鈿，扇，鑲嵌畫，金，刀劍。乘商船往來兩國間的人，大致如下：

由日本至元朝者：

祖龍，雪村，龍山，德元，一清，妙奇，寶洲，性忠，圓種，圓慧，祖雄，良緣，居中，宗已，覺明，仲藏，大智，證圓，印元，齊哲，本淨，善攻，元光，可作玄素，道皎，圓月，契聞，都元，士悞，周及，元選，雪元，祖絕，省吾，海壽，啓桑，中緝，疎石，圓旨。由元朝至日本者：

一山，一甯，四澗，士曇，仁恭，道隱，正澄，楚俊，永嶼，道隆，佛光，覺圓。：：』

氏又敘述日本與明清兩朝的關係如下：

「：明廷專政意於安撫四夷，而輕視貿易，因倭寇活動，故認定和日本貿易關係殊有調整的必要。在棧小松天皇的應承十一年，締結了日明兩國貿易條約，設定一種制度：每一貿易船皆給予勘合符，以與福祿布政司所存的底簿對照。自明至日本的船舶，亦須將勘合符拿來和日本政廳所備存的底簿印證，然後方

可進行貿易。自後十五年間，兩國的商船共往來六次。當應永二十六年，足利義持維斷絕了交通，始告停止。直至後花園天皇的天文十六年這一百十五年間，勘合船共往來十一次。是時貿易港爲甯波，貿易貨品，由日本出口者，計有：硫黃，銅，蘇木，扇金，犀風，刀劍等等。

註：硫黃的出口，第一次二十萬斤第三次二十九萬斤，第四次二十萬斤。

銅的出口，第三次十五萬四千五百斤，第四次二十九萬斤，第十次二十九萬八千五百斤。紅銅由但馬，美作，備中，備後各地運至尾道裝載。蘇木用作染料，一次出口十六萬六千斤。

刀劍運出第一次三千，第二次三千，第三次二萬，第四次三萬，第五次七千，第六次三萬七千。

趁便船來往兩國的人，茲臚列於下：

由日赴明者：

祖來，文珪，九潤，佐良，汝霖，宣開，如瑤，中正，圭密，道淵，中誓，永頊，元大滋，清啓，妙增，玄樹，雪舟，妙茂，慶瑜，桂梧，光堯，宗設，永乘，周良，真樂，歸庭國，肥富某，友梅，瑞佑，等息。

由山良心，加藤清正。由明赴日者：

陳孟榮，陳伯壽，陳子真，俞良甫（以上爲著名彫刻家），良懷，祖開，道彝，元倫，一卷，一如，趙居，仁全論，呂淵，雷春，無逸，昌虎。

明朝遣使至日本乞授軍隊軍資者，共有十四次。其赴日人員如下：

第一次爲都督崔之及參將林高，第二次爲水軍都督周鶴芝，第三次爲周鶴芝及參將林喬舞，第四次爲陳心勝與黃徵蘭，第五次爲周鶴芝，第六次爲林皋，第七次爲馮京第與黃孝卿，第八次爲鄭成功的使者，第九次爲鄭杉，第十次爲馮京第與黃宗義，第十一次爲俞國南，第十二次爲湛微，第十三次爲鄭成功的使者，第十四次爲張光啓與張斐。

移入日本的明代文化

日本的禪僧和明的禪僧在文學上的親密往來，使五山文學大形發展，五山名僧的文學作品，竟完全脫離日本的作風，而使人誤認爲中國人所作。書籍輸往日本者，計有名僧的語錄，詩文集，經史，教乘法，三寶感應錄，寶退錄，北堂書鈔，鬼園策，史韻，歌押韻，誠齋集，張浮休書漫集，遜齋閑覽，丙湖集，類說，揮塵錄，百川學海，老學菴筆記，佛祖統記，法苑珠林，祕簡。

這時代日本印刷術已經發達，五山版很是盛行。在五山的名寺中，常刊行語錄，僧傳，詩文集等書，而儒教書籍，亦有大內版，今川版，薩摩版各種版本。醫術方面，田代三喜氏堂留明十二年，學成醫術歸國，傳入李東垣和朱內溪的醫學。曲直瀨一溪嗣其遺徽。阪淨里則修得張仲景的醫術歸國。吉田宗桂和竹田昌復亦學於金翁，皆有所成就。金持重弘則習得鍼砭之術返國。昌虎首座和良山義宣獲得藥方之後，即

僧鄭傑功返國。明人陳順且親至九州開業行醫。藥品中的原料如人參、甘草、麝香、龍腦，皆有輸入。

繪畫方面，墨水繪的畫法移入，於是出了如拙和周文等畫家。而雪舟且作破墨山水，馳譽國中。餘如土佐光信和狩野元信，亦皆參酌過元朝的畫風。

建築則盛行一種融合禪寺和邸宅的樣式。伊勢松阪的祥瑞，在明的桂語處學習了創造陶器的方法歸國。明僧如定當至長崎傳授架設石橋之法，玉工亦東渡，傳來眼鏡的製法。食物則有禪僧從明朝傳入饅頭和豆腐的製法。

清代（日本江戶幕府時代）中日兩國的關係

在豐臣秀吉時代，曾禁與中國交通，及至德川家康在建立江戶幕府，即行解禁，准許和中國交通貿易。當慶長五年，有清船十三艘來長崎請求貿易，元祿元年，限定清船七十艘來航，並置商館於長崎，製訂貿易章程，規定交易銀和運上銀（今之關稅），是後中日的交通貿易，均薈集於長崎。

德川氏江戶幕府時代，中日兩國人士的往來，大要如下：

自清國至日本者

儒士又書法家

朱舜水、陳元斌、朱子章、泌變庵（以上儒士），俞立德、胡兆新、徐荷舟、劉培泉、趙陶齋（以上書

法家)。

醫師

魏曼公(獨立)、化外、王甯宇、朱子章、吳載南、陳振夫、趙湘陽、劉經光、汀州、朱來寶、雙玉、周致來、孫輔齋。

僧侶

心越、超元、逸然、獨立、澄一、大眉、高泉、大鵬、卽非、隱元、木菴、千朶、千凱。

畫家

超然、伊孚九、沈南蘋。

騎射家

陳采鹿、沈大成。

這些渡日的中國人，對於日本的儒學，書法，繪畫，彫刻圖章，建築，音樂，工藝等的發達，均有促進之功。又因清國勞工東渡，亦傳來彫紅，沉金，嵌鑲畫，皮革等製法。書籍計輸入四書集成一萬卷，皇朝經解六百卷，康熙字典四十卷，其他如天文、參證學、法制、幾何、水法、醫方、藥種製法的學術書，水滸傳，三國志演義等稗史和金瓶梅，紅樓夢等小說甚多。

肥前伊萬里的東島德右衛門，曾在清人處學得釉彩色瓷器法歸國(成伊萬里瓷的鼻祖)。而越前的國田

兵右衛門、宇野與三郎等十五人亦親赴北京；松前的孫太郎亦赴滿洲；間宮林藏且遠至北滿。

在江戶幕府時代，中國人之歸化於日本者爲數不少，其子孫輩且多任通唐事及唐年行事等職。中國語言學者，有彭城宣義、鄭昌、馮璞、陳勁其他二十餘人，皆任譯官。在嘉永三年，奉幕府命令，撰成中國語的辭書。……」

實在的！日本和明清兩朝的關係是更加密切，日本僧人絕海中津在親見明太祖的時候，就曾獻詩如下：

「熊野山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

明太祖也作詩和他說：

「熊野山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應肥；昔時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竟不歸。」

從那時起，中國沿海一帶即發現「倭寇」，日本也很幫忙勦捕；直到明亡清興，遣老重臣還常常遣使日本，乞師乞資，前後共有十四次之多。日本方面自德川家康執政以後，深知「天下自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便決心提倡「儒學」，獎勵文化教育，於是便有所謂朱子學派的，陽明學派的，古學派的，濠起雲湧，洋洋大觀；即在所謂朱子學派裏頭，又有純粹的程朱學派與山崎闇齋派的分別，古學派裏頭也有山鹿素行派伊藤仁齋派和物徂徠派的不同，但他們都是各以所見盡力發揚儒家的精神，其影響實在是普遍廣大，全日本的藩侯都在所轄區域內設置學校，教育子弟，結果差不多中流以上階級的人士都有相當的漢學的

餐養，（這不像前此各朝僅限於一小部分的「貴族」們，惟以四六駢文和吟風弄月的詩章拿來作爲消遣，與「精神教育」和人的修養全不相干的那個樣子），這麼一來，日本「忠君愛國」的思想便打下「牢不可拔」的基礎，成爲近幾十年來強盛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此外如清朝的考據學，亦並能助長日本史學的發展，尤其是「尊王主義」在日本的「中心思想」的構成上，顯有功績。總而言之，日本對中國文化，幾千年來都是以滿腔熱情來接受的，這種情形得在嘉慶時遊歷北京回來的朝鮮學金秋史對他的本國文化的前途也發生杞憂。他說：

「……日本文字之起，自百濟王仁始，……其時不運中國，凡係中國書籍，皆資於我。……百餘年來，藤樹物部之學大盛時文專尚滄溟。……今見東都人篠本廉文字三篇，一洗卑陋僻謬之習，詞采煥發，又不同滄溟文格，雖中國作手，無以加之。噫！長崎之舶日與中國呼吸相注，絲銅質遷尙屬第二，天下書籍無不海輸山運，昔之所以資於我者，乃或有先我見之者。篠雖欲不文，不可得也。……」

不錯！在歐美帝國主義者未挾其堅船利砲東來之前，東亞大地的文化殆無不以中國爲惟一的策源地，雖其摹倣的程度有深淺，影響的範圍有廣狹，而其核心則固中國民族數千年來一貫相沿未改的精神，又因壤地的隣近及交通的頻繁遂移植四方，儼然足與歐洲的希臘羅馬執西方文化牛耳者分庭抗禮，故截至距今百餘年以前，東亞諸國家都以追隨中國爲常務之急，而中國文化遂與東亞諸國家有過極深長密切的關係。

那個名字叫做霍爾 Captain Basil Hall 的英國船長記載他在西曆一八一六年（清嘉慶二十一年）跟隨英國所派來華的大使一行遊歷遠東即驚嘆於如下的事實：——

「在中國日本朝鮮及其近海諸羣島，雖語言各自不同，而文字則完全相同。一中國人，或不懂一朝鮮人，或日本人所口述者，但彼輩若以筆談則彼此意思即能明瞭。其原因可作如是解釋：吾歐人能讀其書。反之，中國及其他東洋人則無字母無標音符號，彼等記錄思想意見無聲音之妨累，故彼等之單字即可稱為「思想之符號」。今所有國家均採用相同之單字以發表相同之思想，因之彼等所書寫者彼此自然能完全瞭解也：……」（參觀所著 *Voyage to the West Coast of Corea and the Loo-choo Islands*, Chap. I, Pp. 17-18.）

其實中國與東亞諸國家相同之點，豈僅漢字一項而已？而漢字勢力的普遍偉大，也就很夠使西洋人「驚異不置」！可是話又說回來了，中國文化影響於日本方面固然很是鉅大，而日本亦並非一味的盲目模倣，毫無改善或貢獻的，所以遷善之助博士便曾聲辯過，說：「……奈良時代之前後，日本一心的吸收中國文化，並事模倣，直至藤原時代，始漸次發揮大和民族之特長，不獨得見日本文化之獨立，且遭日本文化略有逆輸入中國之事蹟。扶桑略記載，醍醐天皇延長四年（五代後唐明宗天成元年——西曆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之記，有招興福寺寬建法師之事。法師請乘唐商之便船入唐求法，巡禮五台山，許之。……法師

更請將當時有名學者菅原道真、紀長谷雄、橘廣相、郁良相等之詩九卷攜去，亦許之。此時並將小野道風之行草書各一卷付寬建令流布於中國。可知當時日本之文學及書道，對中國已稍指示。關於文學，暫置不談，先就書道言之。日本至平安朝初期爲止，尙屬類似中國之書風者居多。例如嵯峨天皇、弘法大師、橘逸勢等，雖多少已帶有日本風之特長，然大體尙與中國之書風無異。及藤原時代，日本風漸成，發揮其特長。元亨釋書之著者東福寺虎關師鍊，著異制庭訓往來，論及日本之書道，謂日本延歷大同之際，和漢同其芳躅，天曆天喜時，和漢異其闔域，卽此一言，已得盡日本書道之沿革。藤原時代，能使日本書道，開一新機軸者，爲有名之三蹟，卽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三人，此三人實爲日本書道成爲日本風時期之代表。寬建將道風之書攜去者，蓋自信堪對中國書道界誇其特長。反響究竟何如，今雖無足以證明之材料，惟後來澈照入宋時，宋人極讚藤原道長等之書，以此相比，可知道風之書，當有大聲價。此雖尙不能說卽是日本文化向中國之逆輸入，然日本對中國，已漸誇示文化之發達，足以證之。聖德太子御著勝鬘經義疏，亦傳入唐，後更有法雲寺僧明空，註以私鈔成六十卷。承和五年圓仁慈覺大師入唐時，始知該鈔之存在，錄寫攜歸，藏之叡山。貞觀十三年（清和天皇年號）——卽唐懿宗咸通十二年——西曆八七一年圓珍智證大師跋其旨趣而流傳之。鎌倉時代西大寺之叡尊與正菩薩，亦錄寫一本，於江戶時代貞享三年（東山天皇年號）——卽康熙二十五年——西曆一六八七年）付刊，傳之今日。日本人之佛教著作，傳入中國，由中國人加以註釋，可稱一種文化之逆輸入。（下略）（見俞義範氏所譯「中日文化之交流」第二十一至三十

一頁）惟中國所受日本影響最爲鉅大的時代還是要算前清末年，我們只要翻閱一下王輯五氏所編著的「中國日本交通史」一書裏的第十五章便可以明白了。

第二講 中日關係的根本觀念

在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大東亞戰爭爆發以前，筆者看到美國韓特先生所作「中日何以會成世仇」的一篇長文，覺得他所根據的事實和所解釋的理由，很有「補充」或「訂正」的必要，例如韓特先生以爲這幾年中國與日本打起戰來，拚得個你死我活，在美國有些人說：「我們看不出日本人與中國人有什麼分別」，這些人之不能分辨中國人與日本人，就好像不能分辨兩隻飛着的蒼蠅是否同屬一類的那樣的困難情形。實在說，中日兩民族性歧異之大，恐怕世上就很不容易尋覓出另外兩個可以作恰切比擬的實例，有之，惟德法兩民族，稍能在這裏，「相提並論」。中國人喜歡個人主義，喜歡不受羈束，故可說是東方的法國人；日本人喜歡合羣工作，喜歡集團，故可說是東方的德國人；我們西方人必須明白了這兩民族間的歧異的地方，然後可以了解兩民族間所發生的事情，和他們的難以解決的糾紛。日本人善於合羣工作，中國人長於單人獨幹，對於這點，可謂各走極端。所以假如我有工作需要數人以上合幹的，我必聘請日本人，假如我有工作需要一位，有創作性而心思靈妙的人幹，我必不用狐疑的聘任中國人。單人對單人，中國人無論如何勝於日本人，但合羣工作，其效率却不及日本人之高。以個人對個人來說，中國人並不劣於世界上最優

中日兩國
民族性第
一歧異之
點——「個
人主義」
與「合羣
工作」

秀的民族。但兩個中國人碰在一起，却很容易便相互發生意見，除非他們兩人有血統關係。他們往往相互衝突起來，不理會這對於其他的人們有無影響，有無損害，所以在商業上，中國的公司制度至今還未實際樹立，一切企業，只有家族性質的纔站得久些，如需要招外來股東，不久便有許多是非。在社會革命上中國經過了這麼長久的時間還沒有成功，是緣故也不外如此，日本人碰到要單人幹的工作，工作效能便很低，所以日本空軍始終不行。一位飛機師坐在飛機裏飛行的時候，他決沒有時間去詢問旁人或參考書本，然後轉換方向，他必須有創始能力，而且還要心思靈妙，這是日本人最欠缺的。假如上帝給日本人以創始能力，他們的成就真是了不得。另一方面假如上帝給中國人以合作習性，則以中國人的心思靈妙，兼以合作習性，再加以四萬萬的人口，中國還不是世界上天字第一號的大強國嗎？日本人既善於合羣工作，所以他們具有集團精神，同時，在世界上一切民族中他們最崇拜的是德國人。中國人呢？他們羨慕法國人的人生態度，他們不喜歡集團，不願受約束。所以每個在東方和歐洲住得相當久的人，都覺得日本人跟德國人非常相像，而中國人最像法國人。日本人的生活無處不表現其集團精神，就以建築鐵道的工人為例吧，他們的工作很像戲台上的跳舞，一開口號，他們的斧頭齊舉，第二個口號一呼，他們的斧頭齊落，於是像體操一樣，大家一齊舉起足來進前一步，跟着一聲口號，斧頭又齊舉起來，這樣的循環進行，好像機器一樣。這樣的情形，是中國人所不能想像的，假如他們在場，他們會不由自主的笑起來，他們認為這樣子的工作是無意義的，是非人道的。不過日本的能夠現代化，確應歸功這種集團精神。中國的法制並不後人，牠的

法律可說是世界最完善的。就說禁烟條例吧，他們實在比美國的高明，但中國仍有數百萬畝的肥土在種鴉片。中國與法國甚而在藝術上也是相同的，試將北平紫禁城的博物院與巴黎的比較一下，便知道了。尤其有趣者，世界上以中法兩國最講究吃的藝術，他們並不是互相摹倣，他們的烹飪方法各不相同，不過其「講究」處却如出一轍。這本不值得奇異，他們對人生的態度既是相同，對食品的觀點當然也是相同的。每有宴會，中國和法國的廚子都想弄出一味新奇的菜式，他們在廚中用心思，猶畫家在畫室中用心思一樣。對於這點，德日兩國却正相反，因為這兩國最注重嚴肅的成規。中日兩國相互間的外交關係與德法兩國的也無異致。以上所論，即韓特先生所主張中日兩國很難有「結合的可能」而必成爲「世仇」的理由之一。

誠然，我們中國的民族性有許多實在接近法人，優良的方面如韓特先生所講述的已可「舉一隅而以三隅反」了，至於黑暗墮落方面也正復相同，遊歷過法國的人就知道普通法國人的生活也都吃得差，住得壞，在中等旅館裏發現臭虫是很尋常的事，沐浴及清潔的習慣並不十分認真講究，公共娛樂場所大聲喧嘩，舉行集會多不守時刻，自殺暗殺的事情不時見於報章。即在首都巴黎，破舊的房子仍佔着一個很大的比數，街道有不少骯髒得很，在那二十四橋的寒納河畔，長日躺着許多襤褸不堪的失業者；伸手討錢，唱一小曲以求一飽的乞丐，居多還是壯年的男子；至於滿街的咖啡店，滿座的無事閒人，苦悶的對着空杯，不知怎樣排遣時光的情景，真令人不知和中國的北平天津上海廣州等地的區別究竟在那裏？至於日本的相似德國如整齊嚴肅，尙武愛國，嗜好音樂，傾向悲觀主義等均成爲一般的定論，韓特先生所論，並非錯誤。但我們

所論並不
完全就是
事實

應該知道這個「比喻」並不能推到極端，因為中國和日本到底是東亞兩個黃種人的國家，而過去幾千年兩國在「血統上」和「文化上」又有「淵源很為深厚」的密切關係，所以兩大民族的國民性雖然有許多是彼此顯然「互為歧異」的，惟幸好此種並非性質上的不同，而實為程度上的不同，我們試從日本人的習慣，諸如洗澡，衣服，飲食，居住來看，或自賦性的「急進」「矯激」而論，都很像中國南部的人，最有趣的是近代學者曾用科學方法分析各民族的血統，研究屬於此民族的人的紅血球與屬於彼民族的人的「血清」的混合，若紅血球能集成叢，便叫他做「凝集」，這種元素是從遺傳而來，經過任何疾病環境都不會變更的，所以有人曾經測驗過湖南省的人民的血統百分率，拿去和日本人的血統百分率比較，極為相似，這是科學的「真理」，決非「偶然的現象」，也許湖南省與日本人是確有血統的關係，只因兩方的遠祖，一支向東北海島發展，纔進佔了現在的日本，另一支又向東南發展，就進佔了長江流域的南岸，根據此種事實，不禁令人對這次差不多有二十個月的中日戰事，要深深發出「兄弟鬩牆」「手足相殘」的嘆聲呢！再說韓特先生以中國人長於單人獨幹，故國家常為褊狹的個人主義所累，幽默大師林語堂氏也說中國民族是一個「個人主義者」集合而成的民族，中國人只有家庭意識，沒有社會意識，而所謂家庭觀念又只是擴大的自私心；中國人就是在遊戲的時候，也不知道如何合作，中國人喜歡搓麻將，就是因為牌局中四個人可以「各自為政」，無需聯絡。中國人除了家庭之外，沒有一點團結，日本人好像岩石一般凝固，中國人却好比一盤散沙。不錯！中國因產業落後，社會進化還在農耕生活的階段，地面遼闊，交通不便，人民貧困

，教養太差，比較工商業發達的國家，其團結力與合作的程度自然「相形見绌」，但我們若能「深入民間」，中國也並不是毫無組織的國家，怎樣見得呢？試看「聚族而居」的事，各地都有；鄉保城市自治的團體「其多如林」，「同鄉團體」與「職業公會」及秘密結社等更屬「司空見慣」，這樣，我們如何可以「閉着眼睛」一口咬定「中國就是一盤散沙」？若從日本人富於「合作習性」，中國人善於「單人獨幹」這一個差異之點上，就斷定中日兩國將永成爲世代的仇敵，這在「論理學上」和實際的事實上無論如何都是絕對講不通的。

中日兩國
民族性第
二族異之
點——「
自高」與
「自卑」與
的意識

韓特先生又根據心理學家所說，以爲有些人有自高的意識，有些人有自卑的意識，中國人是有自高意識的民族，他們常覺得他們是最優秀的，他們自詡前代有過燦爛的文明，所以非常覺得滿足。他們常以向外國人領教爲恥，他們常說：「你們外國人不要臭得意，我們祖宗會穿絲織衣服的時候，你們的祖宗還是猴子」。當我（韓特先生自稱）在遠東的時候，有一次有一架飛機在天空飛過，我指給一個中國人看，他看後像「毫不在乎」的樣子說：「這些東西是我們用錢僱你們外國人給我們製造的，你們造好了，我們便自己來用」。日本人對於向人領教一層，並不覺得難爲情，只要覺得對於他們有用，他們無不低心下氣去詢問，不論上下級的人，都有這個習氣。按此確係事實，這是因爲歷史期的長短，最足以型成人的各種心習，無論個人、家族、國家，凡是歷史期比較久遠一點的便很容易產生驕傲心，助長其「抱殘守闕」的頑固性，因此常爲時代的落伍者，比如埃及的一個祭司就曾對希臘的大立法家梭倫說過：「希臘只是個「叫鷲

「蒙昧」不懂得過去情形的小孩子」，很足代表這種令人不可響邇的氣餒。我們中國幾千年來所處的環境也怪可憐的：在東南方面全是大海，對岸却爲亘古從未開闢過的亞美利加洲，西北既被高山鉅嶺縱橫遮斷，又多出一個「茫無邊際」的戈壁大沙漠，使和歐羅巴洲的交通來往，異常困難，而環繞國境的許多民族如南洋暹羅緬甸安南西藏蒙古朝鮮等等的文化又很低下，沒有足以「觀摩，刺激，興奮」的資格，所以我們中國「目空一切」的傲大性，代代相傳，纔成了近世「倒退落伍」的一個局面。我們自從明末清初和歐洲文化接觸起始，那時已經有許多西方人如湯若望利馬竇等把天文數學等輸入進來，以時期而論，實在比日本與歐洲文化發生關係的年代還要爲早，假如聽其自然發展，三百年間當然可以有些「了不得」的成就，可惜自滿清入關，仍然利用中國的舊文化來統治天下，把明朝的辦法照原來的樣子「蕭規曹隨」的實行下去，「科舉制度」差不多與清朝共始終，故許多聰明人的頭腦都陷在「八股文」裏許多心血都費在一部四書味根錄裏面，其中雖然也有許多不爲「積習所囿」的奇才異能的人，但仍不能跳出五經三傳的圈子，他們擺脫了「八股文」的魔手就只好去研究音韻，文字，訓詁，校勘的學問，古代書籍固然通通增加了一些整理解釋的工夫和材料，但他們並沒有把中國文化推進一步，日本在方面顯然是「後來居上」，中國即在近年，在不少的文字裏，還有意無意的流露着「文明古國」「炎黃華胄」的字樣，墨子書裏的「木齋」現時雖沒有人再敢說卽是今日「凌空翱翔」的飛機，而韓非子裏所表現的思想，居然有些學者以爲和今日英國的「虛君政治」與「內閣責任制度」等一樣，如此牽強附會一點很零碎不成系統的學術上的常識，其

例子實不勝枚舉，故我國人仍多不肯「虛心下氣」的去研究歐美文物制度的「究竟」，不肯誠懇的「取人之長，補我之短」，韓特先生所以批評中國，推揚日本，並非過當。惟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一事，即中國在過去雖為環境所限，不容易和世界上有高等文化的民族接觸，但偶然有與本國完全兩樣的「思想文物」傳來，則必加以熱烈的歡迎，漸漸的吸收類化，使其帶有濃厚的本國色彩，如印度的佛教從東漢明帝時博士秦景憲受大月使者口授的佛經起始，到西晉及南北朝的時候便有許多中國人前往印度求取經典的，一時佛法盛行，朝野上下都彷彿有「求知如渴」的樣子，甚且使之廣播於朝鮮半島的高句麗百濟等國，間接傳入於日本，其影響直到現在猶使一般旅行日本的看到隨處都是「寺宇林立」，佛教勢力正方興未艾。再如音樂方面，從西漢武帝南北朝隋唐以來即與西域一帶發生密切的關係，於是便由西域傳入許多新奇的「樂器」與「樂舞」，且不僅「音樂」如此，即當時網羅於西域一地所有的西亞細亞南亞細亞乃至希臘羅馬的文化都「兼收並蓄」，我們現在讀了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等人在那裏探查的遊記著作，纔知中國實有「泱泱大國」之風，其從善如流的熱忱並不在日本之下。林語堂氏會說，把中國歷史打開一看，除去近百年不算，也無怪中國人自大。可與中國文化媲美的只有印度的佛教，有許多事在中國人看來，簡直是野蠻，比如夫妻手攜手並肩而行，父女間的接吻，銀幕上的接吻，車站月台上的接吻以及各式各樣的接吻，看到了這些事情，就不能不使中國人相信中國的文化是最高的。不過也有一些事，中國人覺得可取，比如普通人能讀書，女人會寫信等等，此外還有一些事情，如火車、輪船、電話、照相機，都使得中國人的自尊心全

中國近年
已由「自
高意識的
民族」淪
為「自卑
意識的民
族」

中日兩國
民族性第
三條異之
點「獨創
性」

部動搖了。結果今日中國分成兩大陣線，共產主義與反動勢力，有思想的年輕的一代主張推翻中國全部的文化及政治制度，同時統治階級却進行保守的反動運動，如果保守派的領袖不能替中國求到一條出路，中國最後也許不得不投到共產主義的懷抱裏。他所說的話，確係事實，即以一般留學生的趨勢而論，遊英法者固然喜歡標榜「民主政治」，接近蘇俄的便大事宣傳「共產主義」，去過德意志義大利的又高唱「法西斯主義」，甚至有個笑話，一位剛從外國轉來的青年對着他父親誇張外國一切皆「盡善盡美」的時候，那位父親雖知其已中洋毒，但不能不耐心等他說「月亮也是外國好」的時候，纔覺得有理由給他嘗一個中國巴掌。從這點看來，現在的中國已非如韓特先生所說是有「自高意識的民族了」，恐怕比日本是有所謂「自卑的意識的民族」還來得「萬分可憐」一點！這樣，中日兩國都淪落成爲有「自卑的意識的民族」，依韓特先生的推論看來，是成爲「世仇」的原因之一又已不復存在了。

韓特先生進而論及日本人富於摹倣性，中國人富於獨創性，最可惜的中國創始了一事一物之後，往往不再發揚光大之，甚至常常決然捨去，印刷術及火藥指南針這些東西不是中國發明的嗎？但中國何嘗好好的利用那些發明？日本人最缺乏的就是獨創性，日本雖然製造了許多貨品，但沒有一件是日本「創製」的。日本本身沒有他自己的文化，在從前她是由中國把中國的文化帶過去，採取那些適合於她的需要的，便算爲自己的文化。其後，又照老例，把西方的文化抄襲過去，也算爲她自己的。有一例最足以證明日本的沒

有獨創性。日本在很早以前本已從中國學得印刷術，但她直到西方國家發明了印刷機器之後，然後纔有報

紙。日本人的摹倣能力確不後人，而且還善於大量抄襲。在千年以前，她把中國所見的東西都摹倣過去，由宗教、衣服而至道德藝術。我有一次在一個僻遠的中國鄉村經過，在那裏我認識了日本。日本女人頭上的高髻，我從來只在日本見過，據日本人說，這是他們女人裝飾的特徵，但我所看到的那中國鄉村的婦女，頭上統是那種髻，可知那種裝飾是日本從中國偷過去一直流傳至今，而中國大部份却在許久之前提便已把他拋棄了。曾經遊歷世界各大國家的人，假如到日本去，他會看到許多建築與設備好像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一般，慢慢的他便覺悟到這些都是日本從各處摹倣來的。以東京的隧道來說，牠確是採用倫敦巴黎紐約柏林各處隧道的所長。惟其他他們能摹倣人家的所長，所以造出來往往會比人家好。至於中國人呢，他們決不耐這種麻煩，假如中國人要造隧道，他們只聘請外國工程師照他的本國的樣式造出來，要不然的話，他們便用中國人照中國自己的方法建造。這段話說的很幽默有趣，中國人富於「獨創性」，這在過去是很對的，黃尊生氏曾說：「中國民族的創造力是很可驚的，從過去五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來看，中國人文之盛，實繁於其學術之發皇，歷代以來，每有創作，如科學則有曆算，天文，地理，醫學，以及羅盤，火藥各項之發明。製作則有絲，茶，陶，磁，金，玉，漆，繡，以及建築，雕刻，製紙，刷印各門之技藝。哲學則有周秦之諸子，漢之經傳，六朝唐之佛法，宋明之理學，清一代之考據。文學美術則有古文，詞賦，詩歌，劇曲，書法，繪畫，音樂，無不燦然大備，一代有一代之創作，一代有一代之色彩。不過在近來，則此種創作，竟然絕迹，不惟絕迹，而且連舊時所有的都保守不住，紛紛失去。比如戲劇，我們向前望一望歐洲

中國人的
獨創性近
巴塞斯消
矣

日本人善於摹倣非他國可恥之事

日本人自信亦有若干發明

的國家劇院，再回憶一下中國過去的琵琶記牡丹亭，又再睜開眼睛看看目前中國的戲劇（無論新的舊的），或者銀幕上的中國電影，一看其彼此相差之巨，便可以了解出這個道理。戲劇如此，文學亦然，音樂亦然，建築亦然，其他一切的學術，都無不然。無論文藝作品，學校音樂，都市建築，都不過千篇一律，彼此為一種無生命的模倣。『這樣，是我們中國人的「獨創性」到了現在，不惟不算豐富，而且是已經消失了。至於說日本人富於摹倣性的話，那是「千真萬確」，沒有疑義的，惟摹倣也不能即算是一件可恥的事，法國的社會學大家達爾德氏主張摹倣是社會進化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在所著的那本「名傳遐邇」的「摩倣律」的書裏，發揮這個道理，很為詳盡，試隨便拿幾個國家來講吧，現時歐洲的羅馬尼亞國便是事事以法國為「準繩」而「一步一趨」的加以摩倣；但法國的文化便是從摩倣羅馬而來的，羅馬的文化又是從摩倣希臘而來的。此外如在十八九世紀之間，（前清乾隆嘉慶兩朝的時候）英國竭力摩倣法國的風尚，藝術，語文等等，法國也摩倣英國的立憲制度與工業發明等，後來世界各民主國家又多有摩倣法國的憲法和政府的機構。這樣看來，一般輕視日本的文化，以為她不過是一個「手敏心靈」的東亞猴子，沒有值得注意的價值的人，實在是犯了不明瞭人類文化進步的真實情形的錯誤，而且在日本學者間也有替他們本國自身辯護的說，「萬世一系的皇室制度與片假名的五十音圖」即為日本人的偉大發明，又如「行蹤遍全球」最有世界眼光的鶴見祐輔氏也在很堅決的說，日本雖曾吸收攝取環宇的文化，但却非常熱烈的保持或擁護從先史時代以來相傳不絕的「古神道」，凡所有從異邦輸入的文化，都通過使之投入古神道的「熔鑪爐」

裏。按我們中國人和一般歐美人研究日本的動輒就忽略了「神道」在日本的種族方面和宗教方面所支配的力量。日本天照大神以「日出之國」委諸其子孫，所以「爾皇孫等善治國家」的神話的宣言，到了現在大約有兩十五百年還底爲「上自大臣，下至輿夫皂隸」所絕對崇信而未嘗發生過疑問的事，所以每一個日本國民都相信他即是神的子孫，天皇卽爲神父；神道的具體對象因此成爲「種族」天皇「國家」三者，而其抽象的對象乃屬於自然與祖先的崇拜。如此凡日本人都對於其身世都抱着「萬邦無比」的信念，更以特殊的方法吸收近代西洋的民治主義與基督教的思想，融化而貫通之。有人說，選擇得當就是創作，一切創作也無非是選擇，那麼說日本只會「一味」的摩倣，就不免太冤枉了她；而以她富於摹倣性，中國人富於獨創性，就說這兩個民族非成爲「世仇」不可，豈非「神經過敏」「判斷過速」嗎？

中日兩國
民族性第
四枝異之
點——要
區情緒各
不相同

韓特先生又會論到關於愛國情緒，日本人跟中國人也不相同。日本人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以愛國情緒和宗教情緒結合而爲一的。所謂忠君卽愛國，如不忠君無論如何不能說是愛國。他們把天皇視作神明，凡有戰事，他們都說是爲天皇而戰，爲天皇而死。他們把天皇列第一，國家列第二，人民呢？可憐得很，只得屈居第三了，這與德國何等相像？納粹社會主義不也在把宗教國家，領袖混在一起嗎？中國人却認種族第一，疆土其次。中國人除了自己的祖居和其鄰近，對其他地方看得不甚關切，誰人佔了那些地方都不要緊，只要他可以到那裏找生活，這並不是中國沒有愛國心的表現，而是他們看種族較疆土還來得重要，蒙古人滿洲人都曾入主中國，但結果蒙古人和滿洲人都給中國人同化了去，其緣故就是：在疆土上中國是失

中國人自
古亦極重
疆土

敗，但在種族上中國是戰勝了。按韓特先生對日本所謂的「神道」似不曾有深刻的研究，故以日本人民把「愛國情緒」和「宗教情緒」結合爲一當做是特異的事，而稱日本與德國的納粹社會主義非常相像更顯得他的觀察非常「皮毛淺薄」，因爲像德國納粹社會主義那樣在全世界各地發現的法西斯主義和以勞工專政如蘇俄那樣的共產主義等都是爲人民對於其本國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的一種反動表示，日本的政治原來就向着一條直線前進，故其本質與所謂德國的納粹社會主義實在不能「相提並論」。至於說中國人看種族較疆土爲重的話也不盡然，試看從周朝的開關中原到秦漢時的統一中國，以「封建」爲殖民的手段，幕路藍縷，以啓山林；又以「井田」墾荒，九家相保，出入相扶持；更修築萬里長城，抵抗夷狄；開鑿運河，疏通發展各處遼遠地面。固然，中國是屬於大平原的文化，在地廣人稀的時候，儘有退讓其他人種發展的雅量，不像歐洲希臘那樣「叢爾」「局促」的一塊小土地，非你死我活拚命的不可，惟歷朝聖賢所鼓吹提倡的仍然着重在文化的攻勢——即同化方面，所以古書裏很多有如下所引的一些話，如「舞於戚而有苗來格」，「用夏變夷」，和尙書裏所說：「黎民於變時雍」，「禮失而求諸野」，中庸裏說：「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等等形容得何等偉大！孔子說過：「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也說：「鑿斯池焉，築斯城焉，效死而民不去，是則可爲也。」這些話並可證明中國人並非自古以來即看不重「疆土」的。

最後，韓特先生列舉中日民族對於戰爭的見解也不相同，他自述當他在日本的時候，曾和日本人談及

中日兩國
民族性異
五歧異之
點——
「與愛好
和平」

日本雖尙
武而國內
充滿和氣

戰爭的罪惡，或談及軍縮，他們便很驚奇的注視着他，甚而非笑他。他們認為戰爭是美麗的，是浪漫的，他們把戰爭比作玫瑰，是半女性化的，所以他們的軍官常常組織櫻花會。在他看來，這是多麼可笑的事，這些粗獷的漢子去欣賞櫻花，這不是等於美國水兵聯羣結隊去採雛菊嗎？這真是什麼話！但在日本看來，戰爭既是如花一樣的，這些迎風飛舞的櫻花瓣，當然可代表武士道的精神。中國是愛好和平的，平日他們不喜言戰，凡事不可動武，既動了武，最好化干戈為玉帛。不錯，日本為世界著名的軍國主義的國家，「花是櫻花，人是武士，」也是為日本婦孺皆知的一句名言，凡游歷過日本的人都知道每逢「春盡夏來」，美麗的櫻花就首先在九州南方一帶溫暖的地方開放，漸漸及於北部，田野山嶺間「盈千累百」的櫻樹全成了「花雲」「花霞」，人人且歌且舞，載笑載言，大有「舉國若狂」的樣子，我們假使俯拾一朵落在地下的櫻花來看，則並非像牡丹芍藥那樣顏色的鮮豔，只不過僅有淡淡楚楚很清雅的幾片花瓣而已，而此花下的生命最多祇可以維持十多天，一般日本人很喜歡牠的淡雅的風情，和散落時的潔白，以為和日本武士道的精神息息相通，韓特先生所述確係實情。惟日本雖尙武，其國因千餘年來受儒家禮教的薰陶，所以文質彬彬，不好爭論，繁華街市絕少有「趕趕武夫」出現，全國上下都充滿諷諷的和氣，唐代田園詩人王維會說：「海東諸國，日本為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真非「溢美之詞。」至於我中國自古以來即有「重文輕武」的趨勢，到了近年竟擁有二百萬以上的大兵，在世界各國家中為「屈指第一的陸軍國」，以人數而論，雖至強如蘇俄法德：都得要「退避三舍」「甘拜下風」！且實際

中國近二
十餘年來
養兵最多
戰事頻繁

，戰鬥的次數與範圍亦殊可驚人！南至桂粵，西至川滇，東及蘇齊，北出長城以外，無一處不洒過血花彈雨，其間有皖與直戰，湘與鄂戰，川滇黔混戰，謹法之戰，粵與桂戰，奉與直戰，蘇皖贛之戰，湘南之戰，湘西之戰，鄂北之戰，川鄂之戰，川東之戰，閩南之戰，蘇浙之戰，秦隴之戰。：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也有甯漢的分裂，中央對唐生智的討伐，膠東的變亂，馮玉祥部下與樊鍾秀的衝突，貴州李燊與周西成的衝突，馮玉祥石友三等與中央的衝突，兩廣的衝突，四川劉文輝劉湘叔侄的衝突，：據路透社的通信員統計，此次為民國成立以來四川省第四百六十七次的戰爭；四川如此，別的省份又何嘗不如此？韓特先生並說中國是愛好和平，平日他們不喜言戰的話，未免去事實過遠，使我們聽了「受寵若驚」。此外韓特先生並以為在社會生活上，中國跟日本人也不相同，中國人跟一般白種人一樣，極富幽默感，但日本人却就不同了，他們對一切都認真，對於笑話往往聽不懂其真意，這常常令他們的外國友人非常沒趣，有一次，在日本某外人辦的英文報上發現了一篇揭發日本人缺點的諧文，在外國人看了只笑笑便算了，但日本人却把內容像格言看待。又有一次有一篇文章記載日本人發明電話的經過，日本人也把這篇幽默文章嚴肅地去念，結果，他們是非常高興。中國人善飲，而日本人的酒量却非常小。這段話說中國人是對的，說日本人却有些不對。林語堂氏以幽默是一種心境，一種看法，一種對於人生的態度。莊子以後，所有中國人，不論是政治家還是盜匪都直接間接受了莊子人生觀的影響一齊變成了大幽默家。說中國人不懂幽默等於說撒哈拉沙漠沒有沙。就理論言，中國人應該有幽默，因為幽默產自對於現實的認識，而中國人一向就是現實的幽

中日兩國
民族性第
六枝異之
點——「
直拙無味
」與「富
於幽默」
中日兩國
人酒量上
的分別

默產自常識，中國人的常識，素稱豐富。同時幽默尤其是亞細亞式的幽默又是知足與閒適的產物，而中國人多餘的却正是這兩樣。中國人寫起文章來雖振振有詞，行動方面却嘻嘻哈哈，所以中國人對於什麼救災禁烟之類的事，無不報之以一笑。日本人雖幽默不到這個程度，但我們試翻開他們所出版的報紙，雜誌與及一切小說文藝都不難發現許多的「幽默大師」，至於為羣衆娛樂的場所如戲園，電影，馬戲團等處更充滿幽默的空氣，文人學者，政客官僚，實業鉅子的集會也很少有「面目可憎，言論無趣」的份子，所以韓特先生說日本人不懂幽默，是很冤枉日本人的。又說日本人的酒量非常之小，不知根據什麼調查報告？普通日本人固然善飲，（連婦人在內）而陸海軍人對於酒尤其了不得，他們認為大量飲酒就是英雄豪傑的象徵，所以他們的酒量都是經過長期奮鬥而升級的，他們以為「死且不懼，卮酒奚足？」在報紙上不時看到他們因酗酒泥醉，闖禍受罰的新聞，嗜好「杯中物」未免太甚，韓特先生還以日本人酒量太小，真算不得是一個「日本通」了。關於「體質」方面，韓特先生說中國人和日本人也不相同，除了兩眼傾斜這點大家相同之外，從身材上說，與其說中國人像日本人，不如說中國人像白種人較爲妥貼。中國人跟我們白種人都不能穿日本人的襪子與內衣，內衣的長短或許合用，但袖子必然太短，因爲日本人的手足與身體的比例和其他各國的人比較總是「相形短小」。按所謂中國人的意思是什麼呢？中國的南方人與北方人除了文化上的聯繫而外，在體格上與及性情和習慣等所表現的差異，就如同歐洲的地中海人與諾狄克人所表現的一樣。日本人和體格高大的華北人固然不同，但很和華南人相似，而日本人的襪子與內衣爲旅日華僑和留日學

中日兩國
人體質上
的差異

韓特先生的觀
察淺薄

生所服用的，爲數實在很多，並沒有如韓特先生所形容的「不能穿進去」或「袖子太短」那樣的過大，這是「事實具在，無庸爲諱」的；至於說中國人像白種人的話，不知是皮膚像？還是毛髮像？還是眼鼻像？還是骨格像？簡直令人「匪夷所思」了。總而言之，韓特先生反對「許多遠東的觀察者以爲中日兩國既是同種同文，將來必有聯合的一天」的主張，而另以爲「假如研究一下兩民族的體質上心理上的歧異，就知道兩國很難有結合的可能」，這個判斷，老實說，是如聖經所說，建築於沙灘上面，基礎不很穩固的，所以中日必永爲世仇一說，絕對不能成立，韓特先生若尚不肯承認「理屈」就請再來遠東，在中日兩國多住些時候，重作一番深刻密緻的研究觀察，必能憬然覺悟這篇中日何以會成世仇的文章雖然寫得很生動有趣，但許多意見都免不了有「似是而非的缺點」。這樣所以汪主席就會很沉痛的說過：

「中日兩國在種族上地理上歷史上環境上及一切精神的文明物質於開化上，爲友是自然的，爲敵是不自然的。無論人事上發生如何糾紛，總應該視爲一時不自然的現象，予以適當的解決，使之仍向著恆久的自然的和平親睦的方向前進，這種道理在總理孫先生遺教中說得最明白最透徹，遺教全部中有責備中國的不是，有批評日本的錯誤，但沒有一個字說中日應該爲敵，沒有一時一刻不盼望中日爲友，同心戮力，發揚大亞洲主義。我們同志如果早些遵守遺教，決不會發生三年以來的不幸事變，發生以後如果遵守遺教，冤仇宜解不宜結，則亦決不致在萬三年事變還沒解決。…」

如此我們中日兩大民族都不可不抱着一個「罪己的精神」，大覺大悟，一起攜手來向着建設東亞其榮

團的大道遠進。

第三講 中日基本條約的闡釋

「關於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基本關係條約」是在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即日本昭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西曆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南京簽訂的，其間經過的情形則如同年十二月一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褚民誼博士所述：

「中日兩國不幸發生事變，惜雙方於事前未能以和平方式，共謀避免，事變中又不能從速解決，以致戰事遷延，生靈塗炭，此種不幸事件之起，在於過去中日兩國，雖有少數先知先覺倡導親善，但大多數人民，缺少精誠合作的認識與決心，而兩國關係，未曾明確，以致糾紛迭起，積怨叢生，亦為重大原因之一。總理孫先生謂：「中國革命之成功，有待於日本之諒解」。汪主席亦再三諄諄告於兩國國民說：「中日兩國義宜為友，不應為敵」。日方經三年血戰之後，已深知中日雙方之外交方針與軍事方針，果能一致，且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以謀經濟合作，則中國之強盛於日本有利而無損。是以雙方有識之士，俱以為兩國有精誠合作之必要。但欲建立兩國親善關係，奠定東亞永久和平，必須掃除過去紛擾之原因而建樹新的關係，以確立共同生存，共同發達的基礎。中日雙方同時努力，必須有一共同目標，方能避免利害衝突，不致互為水火。此種共同努力之目標，即近衛聲明中之大原則，

亦即善鄰友好，共同防共與經濟提攜。自三原則發表以後，汪主席乃挺身而出，不避艱險倡導和平運動，日方亦破除層層困難，向此三大原則努力邁進。故三原則爲此次條約之淵源，亦爲此次條約之目標。

但僅有原則，而無範圍兩種關係之規律，與決定具體實施之方針，亦爲徒托空言，因此雙方俱咸覺有早日締結條約之必要。

還都以來，政權確立，日本特命全權大使阿部信行閣下即賁臨南京，始以慶祝國府還都，繼以開始條約之交涉。第一次會議自七月五日開始，至八月三十一日會議結束，舉行正式會議共十六次，並以非正式會議頻頻舉行，爲數尤多，時當溽暑，炎威方張，兩國交涉委員，汗流浹背，但精神之一貫，情緒之熱烈，從不稍懈，雙方不但堅持自己立場，且爲對方設想，故爭辯雖甚熱烈，而空氣始終靜。中國方面欲求無害於光明之前途，而同時又須兼顧實際情勢；日本方面欲求全國內之輿情，而同時又須無礙合作的基礎。用心之苦，非可言喻。議事進行之時，每遇激結，雙方無不悉心研討，於正式會議無法解決者，往往於非正式會議中，披肝瀝胆，獲致諒解。此種親愛之精神，融和之空氣，足徵東亞和平之前途必能光明。無疑條約草案成立以後，各經自國內之種種必要手續，至前日已正式簽字，發生效力；以後當本締結條約之旨趣，努力邁進，奠定東亞永久之和平，完成新秩序之建設。

本約九條，其前序原文如下：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及大日本帝國政府希望兩國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質，於東亞建設以道義爲基礎之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下，互爲善鄰，緊密提攜，及確立東亞永久之和平，並希望以此爲核心而貢獻於世界全體之和平。爲此訂立基本原則以律兩國間之關係，協定如左。……」

按本段就是說明在條約簽訂以後，中日兩國本身，仍舊各保持此本來的狀態，而沒有什麼變更，中國可以發揚中國的特長，而日本也可以發揚日本的特長，在這中間自然不能容有侵略或不平等關係的存在。至於中日兩國所結成的新關係，則是一種新秩序，但這種新秩序，乃是「以道義爲基礎」的，換言之，就不是以帝國主義的支配，或霸道爲基礎的。根據這兩點，我們已經可以知道中日國交條約是含有特異的創造性，不僅不是一般的平等條約，而且打破國際關係上虛偽欺詐的積習，以建立道義的關係。這也就是將東方的道義精神貫注到國際關係上，貫注到外交政策上，一掃西方權謀術數的霸道外交，而爲國際的關係，人類的共存，創造出一個光明的新的途徑。這就是因爲此次中日兩國調整國交，其目的不僅在使此次不幸事變得一雙方可行的合理解決，而尤在此次事變解決以後，永無同樣繼起的不幸事變，不僅在消極方面使今後永無同樣繼起的不幸事變，而尤在積極方面樹立東亞國際間合理的關係，聯合東亞各民族的力量來共圖復興。這樣所以中日基本關係條約的前文開宗明義即鄭重聲明，「兩國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質」，以「道義爲基礎」，「建設東亞新秩序」，確立東亞永久和平」，並「以此爲核心，而貢獻於世界全體之

和平」。三國共同宣言，旨趣亦復相同。本來所謂「東亞和平核心」與德意軸心的意義是相同的。德意核心係以德意兩國家爲中心，聯合歐洲的許多國家，以謀共同擺脫凡爾賽體系的壓迫，另建歐洲的新秩序。歐洲新秩序的意義，決不能解釋作報復的思想，而新秩序的鞏固，必須根本擺脫霸道主義與功利思想，也就是說，歐洲新秩序，不是以德意來代替英法，必須根本消滅一切不和平的因素，使人類間永久鎗兵解仇，世界永無戰爭。這理想固然不能立刻實現，但可以先建設歐洲之和平，以爲世界和平之基礎。同樣的，東亞和平核心，是以中日兩國爲中心，以團結東亞一切的國家，共同擺脫歐美所加給亞洲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種種壓迫。也就是在舊的條約法律秩序崩潰中，建設東亞新的和平秩序，這樣看來，東亞和平核心與歐洲德意核心，其目的也是一致的。

「第一條 兩國政府爲永久維持兩國間善鄰友好之關係，應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並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講求互助敦睦之手段。

兩國政府相約，互相撤廢政治外交教育宣傳交易等事項足以破壞兩國間好誼之措置及原因，且將來亦禁絕之。

「第二條 兩國政府關於文化之融合，創造及發展，應緊密協力。

按以上兩條即爲關於中日兩國善鄰友好的規定，原文所謂「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就是表明兩國的不相侵犯，絕對無所謂侵略，或是不平等的支配關係。不過中日的永久親善，也不僅是消極的不侵犯所

能做到。同時更必須有融洽敦睦的方法，所以更規定「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講求互助敦睦之手段。」但敦睦的手段也可以分爲消極的與積極的兩方面，「兩國政府關於文化之融合創造及發展應緊密協力，」這是屬於積極的方面，「兩國政府相約互相撤廢政治外交教育宣傳交易等事項，足以破壞兩國間好誼之措置及原因，」則是屬於消極的，這就是於培養親善的關係之外，又排去一切足以妨害親善的障礙物。由此可見那船蓄意障礙和平的人所說：「善鄰友好，便是中日合併」的話，我們只要看看本約第一條明明白白的指出：「兩國應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第七條更明明白白的指出：「隨本條約所規定之中日新關係之發展，日本國政府應撤廢其在中華民國所享有之治外法權，並交還是租界」。「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這是國民革命所要求的，如今日本毅然如此約定，這不是日本沒有滅亡中國之心事，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與領土，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營業之自由爲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嗎？

【第三條 兩國政府相約對於足以危害兩國安甯及福祉之一切共產主義的破壞工作，共同防衛之。兩國政府爲完成前項目的計，應各在其領域內，剷除共產份子，及其組織，並對防共有關之情報宣傳等，緊密協力。

日本國爲實行兩國共同防共計，在所要期間內，依據兩國間另行議定，駐屯所要之軍隊蒙匪及華北之一定地域。

「第四條 兩國政府相約，在派遣於中華民國之日本國軍隊，依據別項所定撤退尙未完了之前，對其通治安之維持，緊密協力。」

在必需維持其通治安之期間內，日本國軍隊之駐屯地域等事項，兩國間另行協議定之。

「第五條

中華民國政府允認日本國基於歷來之慣例，及爲確保兩國共通利益，在所要期間內，依據兩國間另行議定，得駐留其艦船部隊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特定地域。

按第三條爲關於中日兩國共同防共的規定，這就是因爲在現在最足以破壞東亞，危害中日兩國安甯的，只有共產黨，所以必須用中日的協力，以剷除共產份子及其組織。不過爲實現這種目的，而須涉及到駐軍問題，所以日本爲實行防共，而駐屯所要之軍隊於蒙疆及華北之一定地域。不過蓄意障礙和平的人或許要說：共同防共便是永久駐兵。關於此點，我們應就第四第五兩條關於駐兵撤兵兩方面的規定來看。在駐兵一方面，統觀全部條約，共計三種：一爲防共駐兵，一爲現行約定駐兵，一爲艦船部隊的駐留。所謂防共，本條既明示其目的在防制「足以危害兩國安甯及福祉之一切共產主義的破壞工作」，又分別其方法，（一）對於「共產份子及其組織，應各在其領域內」實行剷除。（二）對於「防共有關之情報宣傳等」則「緊密協力」。復約定防共駐兵有（一）一定的時間，（二）一定的地域，（蒙疆及華北之一定地域）（三）且依據兩國間的議定，既非普遍，尤非永久。所謂現行約定駐兵，係指過去的條約而言，與此次條約無關。所謂艦船部隊的駐留，依本條約第五條有（一）一定的時間，（二）特定的地域及（三）依據兩國間協議，且亦爲「基

於歷來之慣例」，爲「確保兩國共通之利益」，並非此次交涉所特創特予，尤與單方片面斷行者不同。在撤兵一方面，其因此次戰事而派遣來中國的日本軍隊，則附屬議定書第三條明白約定：「於兩國關係恢復全面和平戰爭狀態終了時，開始撤兵；並應伴治安確立二年以內，撤兵完畢，中華民國在本期間內保障治安之確立」。其開始撤兵及撤兵完畢，均有明確的規定。

「第六條，兩國政府基於長短相補，有無相通之旨趣，並依照平等互惠之原則，應行兩國間之緊密的經濟提攜。

關於華北及蒙疆之特定資源，尤其國防上必要之埋藏資源，中華民國政府允諾兩國緊密協力開發之。關於其他地域內，國防上必要之特定資源之開發，中華民國政府應予日本國及日本國臣民以必要之便利。關於前項資源之利用，考慮中華民國之需要，而中華民國政府積極的予日本國及日本國臣民以充分之便利。

兩國政府爲振興一般通商及使兩國間之物資需給便利而合理計，應講求必要之措置，兩國政府對於長江下游地域通商交易之增進，及日本國與華北蒙疆間物資需給之合理化，尤應緊密協力。

日本國政府對於中華民國之產業、金融、交通、通信等之復興與發達，應依兩國間之協議，對中華民國作必要之援助乃至協力。

按本條即爲關於中日兩國經濟提攜的規定，換句話說，就是把中日經濟提攜的意義，明明白白的寫出來。中日經濟提攜的最高原則，是「長短相補有無相通，」並且是依「平等互惠」的原則而推進，並不是那一主侵略那一國，那一國把一國作殖民地看。接上去就把日本所希望於中國的，用極具體極明白的字句寫出來。一言以蔽之，日本所希望本於中國的是資源，尤其是國防資源。但是第三項即有一個極重要的保留，就是關於資源的利用，必須先行考慮中國自身的需要。換言之，日本不是和帝國主義者一樣，教中國的資源，自己不利用，一切送到日本去，關於這一點，的確可以看出日本對於經濟提攜的誠意，也可以證明經濟提攜是一種平等的合作，重慶的反宣傳，說經濟提攜就是經濟獨占，已經不攻自破。

又本條的第四項，就是規定兩國間貿易關係。這其中誰也不能說是不應該，也不能夠指爲是不平等。第五項乃是規定日本對於中國經濟復興，應行協力及援助的允諾，這是中國所希望於日本的，日本已慨然的允諾了。至於全權委員間了解事項，全部是經濟的問題，並且把目前一切的困難，盡力掃除。例如關於軍管理工廠礦山發還，合辦事業出資比率的矯正，原有資產評價的修正，對外貿易統制的自主，都已有明確的規定。從事變以來，中日人民在戰區內一切關於經濟事業的困難和糾葛，自然可從此得一解決的途徑。

「第七條 隨本條約所規定之中日新關係之發展，日本國政府應撤廢其在中華民國所享有之治外法權，並交還其租界，而中華民國政府則應開放其領域，使日本國臣民得居住營業。」

按本條係關於日本撤廢在中國領事裁判權及交還租界的規定，日本政府這樣態度坦白的自動廢止不平等條約，以爲其他國家的倡導，而使中國得進於獨立自主的國家。至於中國開放其領域，使日本人民得居住營業，那也是國際間通常的現象，因爲在今日，中國終不應再採閉關主義的政策，以拒絕外僑的移入，只須沒有特殊統治地域的租界，且受中國法律的約束，那就不是侵犯中國的主權，所以我們就沒有反對的理由了。

【第八條 兩國政府關於爲完成本條約之目的所必要之具體的事項，再行締結約定。

【第九條 本條約自簽字之日起實施之。

下列簽字者，各奉本國政府正當之委任，將本條約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按以上兩條均爲普通條約所共有，因此就沒有特別加以闡釋的必要了。

附錄一

附屬議定書

按所謂「附屬議定書」便是爲結束此次中日兩國的不幸事變而擬議實行的種種的臨時辦法，其五條的原文如左：

「當本日簽訂關於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基本關係條約之時，兩國全權委員議定如左：

第一條 中華民國政府諒解日本國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繼續現正從事之戰爭行爲之期間內，隨上述戰爭行爲之實行，有特殊事態之存在，並諒解日本國爲完成上述戰爭行爲之目的取必要之措置，因對此講求必要之措置。

前項特殊事態，縱在戰爭行爲繼續中，於不妨礙完成戰爭行爲目的範圍內，務須按情勢之推移，準據條約及附屬文書之旨趣調整之。

第二條 前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等所辦事項，業由中華民國政府繼承，暫維現狀。是以上述事項中之應調整而尙未調整者，應隨事態之所許，依兩國間之協議，準據條約及附屬文書之旨趣，速行調整之。

第三條 日本國軍隊除根據本日本所簽訂之關於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基本關係條約，及兩國間之現行約定而駐

屯者外，於兩國間恢復全面和平戰爭狀態終了時，開始撤兵，並應伴治安確立二年以內撤兵完畢，中華民國政府在本期間內，保障治安之確立。

第四條 中華民國政府應補償日本國臣民自事變發生以來在中華民國因事變所受之權利利益之損害。

日本國政府應與中華民國政府協力，以救濟因事變而生之中華民國難民。

第五條 本議定書與條約同時實施之。

爲此兩國全權委員將本議定書簽字蓋印，以昭信守。

按本議定書所規定的如第三條即已在前而加以闡釋，至於第四條則如湯良禮氏所說：「本條是規定中國要付一些錢給日本的，就是補償日本人民在戰事中間所遭受的各種權利上的損害。我們可以憑着自己的理解力，舉出一個例來，譬如像毫無軍事關係，而由蔣介石直接下令破壞的青島幾家日本紗廠，就屬於這一種損害。可是在同一條文中，又規定日本願意協助中國，救濟一般在戰事中流離失所的中國人民，作爲一種含有交換性質的措施，而且就是說補償日本人民的「損害」，條約裏面也不會規定如何決定其確數。這一點的意義何在，也是非常明顯的，只有瞎了眼或胸懷成見的人纔看不長。日方的願意放棄一切賠償軍費的要求，甚至連在華駐軍的給養也不要中國負擔，事實上就是表示日方確有誠意。要在停戰後的二年以內，把他的軍隊全部撤回去，因爲撤軍越速，則不但中國有利，就是日本也可以減省大量的糜費，使得兩國國家的資源和收入，可以用到建設事業上去，而爲民衆造福。像現在所化的錢，是完全白化的，雙方

都認爲很惋惜，只是不幸得很，到現在還是無法避免。所以蔣介石如果真有誠意，想看到一個光榮的和平，並且促使日軍全都退出中國的話，他所需要做的事很簡單，只須他依着汪主席的勸告，趕快和日本宣佈停戰，那末和平和撤軍，就立刻可以先後實現了。」這話說的很是公平確實。

附錄二

「中日滿共同宣言」

按本「宣言」卽是中國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帝國她表示，其原文如左：

「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大日本帝國政府及滿洲帝國政府希望三國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質，於東亞建設以道義爲基礎之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下，互爲善鄰，緊密提攜，俾形成東亞永久和平之軸心，並希望以此爲核心，而貢獻於世界全體之和平，爲此宣言如左：

一、中華民國日本國及滿洲國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

二、中華民國日本國及滿洲國講求各項必要之一切手段，俾三國間以互惠爲基調之一般提攜，尤其善隣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得收實效。

三、中華民國日本國及滿洲國根據本宣言之旨趣，速行締結協定。」

關於承認滿洲帝國一事，林部長曾發表過一篇文字說：「……滿洲問題是中日糾紛之癥結，也是中日

問題中間的創痕。過去各走極端，遂致擴大，釀成此番不幸之事變。今謀合理之解決，卽所以去此創痕，切斷滿洲事變以來之滋蔓。二十七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鄭重申明「蓋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之合理解決」。蔣中正在大會中對於此點加以說明。謂「日本如能保障在東北問題解決以後，不再侵犯我領土主權，則個人可以挺身負責，使此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所謂合理解決，與保全有別，固非收復，亦非長此僵持，而爲承認。由此可知，滿洲國之承認，在法理上有其根據，在事實上有其必要。也許尖口薄舌的人會說，承認滿洲國不是割地嗎？那麼我們可以答覆，不割地不賠款是解決此次中日戰爭之原則，而滿洲問題則是此次中日戰爭以前既成之事實，並沒有抵觸。……也許尖口薄舌的人又說，連第三者也還未承認，我們自己又何必承認呢？那麼我們更可以鄭重的答覆，英國早已在事實上承認了。蘇俄之出賣中東路又何嘗不是事實上之承認！我們最不明白，中日兩國間的問題，爲什麼自己不敢解決，定要等待第三者的意旨！我們在消極方面爲切斷創痕的滋蔓，在積極方面爲取得今後的協力，認定可以承認，便本着負責任說老實話的精神毅然爲之。我們應該有自主的抉擇，我們不能等待第三者都承認了，纔被迫去承認，也不能因爲第三者還有未承認的，便奉命唯謹。我們決不受尖口薄舌的人不負責任的責備，我們決不受假仁假義的第三者假惺惺的惋惜。……」湯良禮氏關於此點更就國際上的陳例廣爲徵引加以闡釋說：「……不錯，這次的條約，對滿洲國是已經承認了，然而這一點，在歷史上也不是一件創舉，荷蘭曾承認比利時

的獨立，英國會也承認美國的獨立，如果美國的批評家一定要指中日條約的簽訂，是中國忍受了日本的侵略，不是雙方誠意調整國交，那末讓我們另外再舉出幾件事來，給他們看看：例如他們美國自己在喀喇比納海和中美洲所施行的作爲，以及英國在印度和中國的措施等等，或者像列強在經過了無數次的愚拙的阻撓和反對以後，終於在最近也承認義大利的征服阿比西尼亞，以及英國的承認蘇俄兼併波羅的海三小國等等，這是完全依着各人的看法的不同而異其論據的。再者，像最近美國的接管英屬西印度，作爲海空軍的根據地，這在烏拉圭的參議會中，以及墨西哥的許多國家主義派的人物的心目中，都把他看得像美帝國主義的勝利一樣；但在英國方面，却認爲只是一種共同防禦的措施，而我們對於這次中日條約中所規定的有關海陸軍各款，其看法也正是這樣。……」如此說來，我們對整部的基本條約，有以誠懇嚴肅勇敢的態度來履行，絕對用不着再加以無謂的狐疑或絲毫不負責任的冷譏熱諷了。

第四講 中日合作的基礎

以前三講已經反覆不厭求詳的說明中國與日本兩大民族鑒於最近幾十年來的誤解和創痛，現在澈底的憬悟，要廓清所有一切徧狹惡毒的疑慮嫉嫉，來促進或增加親善提攜的感情，但是中日兩國真的能夠邁步走上合作的坦途，必定要有幾種基礎纔可以實現，這幾種基礎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政治的獨立 這就是說，中日兩國若要實現真正的合作，那麼彼此都應該有獨立自主的權力；

然後纔可以內圖富強，外增國勢，所謂「異車齊轍，殊途同歸」，結果必能永遠奠定東亞——甚至於全世界的和平。孫中山先生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日本神戶東方飯店對神戶各團體歡迎宴會上就曾有過一篇極其誠懇的演說詞如下：

「……日本現在是東亞最強的獨立國家，也是全世界列強之一，如果日本真是知道了中國是十幾國的殖民地，用一個獨立國家要來和殖民地相親善，我看這是做不到的事。要明白這個道理，我有一段好故事，可以用來說明：我們廣東從前有甲乙兩個朋友，甲是廣州人，在廣州很有勢力，很有地位，可以說是一個紳士；乙是一個鄉下的世僕，（粵俗：家庭中永久的奴僕名稱，與北方老奴的名稱相似。）還沒有脫離奴隸的地位，後來到廣州做生意，發了大財，也是很有勢力，因為朋友的介紹，便認識甲，便和甲做朋友。有一日，那位甲的朋友請乙去吃飯，兩個人都是很闊綽，搖搖擺擺，去上酒席館；正在街上走到得意的時候，忽然遇到了乙的主人，那位乙的主人，是一個鄉下佬，正從鄉下上街來，沒有穿甚麼好衣，又沒有穿鞋，手內只拿一把大傘，走路很遠，身體極疲倦，忽然遇到了乙，因為乙是他的世僕，所以他便不客氣，便馬上問乙說：「我許久不見你了，你是怎樣變到這樣闊綽呢？你今天穿得這樣好看，是到什麼地方去呢？我走路疲倦得很，你替我拿傘這把大傘，跟我來聽差罷！」乙因為是那位鄉下佬的世僕，所以便不敢推辭，只得替他的主人去拿傘，同他的主人一路走。乙因為要替他的主人去拿傘，便不能同他的朋友甲去吃飯，因此甲要請他的朋友乙去吃飯的目的，便不

能夠達到。我們中國和世界各國，立了許多利益均沾的條約，日本自己還不覺得是中國的主人，日日反要提倡中日親善，這好比是甲要請他的朋友乙去吃飯一樣；在路上忽然遇到乙的主人，那位主人要乙去拿傘，甲當然是不能同乙去吃飯。中國現在就是一個世僕，不是一個自由的人，有十幾個主人。日本要來和我親善，要請我們吃飯，中國和日本同在一路走，不遇到中國的第一個主人，便要遇到中國的第二個主人，不遇到第三個主人，便要遇到第四個主人，以至於第十幾個主人；那些主人和中國人，是決計沒有錯過之機會的，中國人一遇到了那些主人，便要和他們拿傘，就是日本人很有請中國人吃飯的誠心誠意，也是請不成，也是不能達到目的，中國因此便不能和日本親善。若是日本真有誠意來和中國親善，便要先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的條約，爭回主人的地位，讓中國人得到自由身分，中國才可以同日本來親善。照我們的口頭禪，中國同日本是同種同文的國家，是兄弟之邦；就幾千年的歷史和地位講起來，中國是兄，日本是弟。現在講到要兄弟聚會，在一家和睦，便要你們日本做弟的人，知道你們的兄已經做了十幾國的奴隸，向來是很痛苦，現在還是很痛苦，這種痛苦的原動力，便是不平等的條約；還要你們做弟的人替兄擔憂，助兄奮鬥，廢除不平等的條約，脫離奴隸的地位，然後中國同日本，才可以再來做兄弟。』

這樣的理想可惜在當時是不會實現的，直到經過民國二十六年的蘆溝橋事變以後，到了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近衛首相纔發表一篇重大的聲明，其結尾的話有說：

「……日本尊重中國主權，固不待言，並不惜進而對於撤廢其完成獨立上所必要之治外法權，及交還租界，予以積極的考慮。」

如此是中國民族近百年來所疾首痛心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已經表示決心廢棄，何況日本政府方面又屢次的表示所有東亞的各個民族都應該要以本然的立場來互相聯合，因此現在東亞各國的本然的現狀（即政治獨立）就成爲合作的第一個基礎了。

第二、軍事的同盟 日本小寺謙吉博士曾說過：「將來以人口衆多之中國陸軍，盡亞細亞之大陸的任務，以海島帝國之日本海軍，當太平洋之海洋的任務，則極東平和始得確保，大亞細亞主義之理想亦得貫徹矣；是即於一定主義之下，聯結兩國之自然的要素，依人類進化之法則得享永久正當健全幸福之理由也。」（見漢譯大亞細亞主義論第一七九頁）孫中山先生也說過：「……近來亞洲國家歐洲武功文化，以日本算最完全，日本的海軍製造，海軍駕駛，不必靠歐洲人；日本的陸軍製造，陸軍運用，也可以自己作主，所以日本亞洲東方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我們亞洲還有個國家，當歐戰的時候，曾加入同盟國的一方面，一敗塗地，已經被瓜分了，在歐戰之後，又把歐洲人趕走了，現在也成了一個完全獨立國家，這個國家就是土耳其，現在亞洲只有兩個頂大的獨立國家，東邊是日本，西邊是土耳其，日本和土耳其就是亞洲東西兩個大屏障。現在波斯阿富汗阿拉伯也起來學歐洲，也經營了很好的武備，歐洲人也是不敢輕視那些民族的。至於尼泊爾的民族，英國人尙且不敢輕視，她自然也有很好的武備，中國現在有很多的武備，統一之

後，便極有勢力，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道德做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亞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勢力。不過對於歐洲人，只用仁義去感化他們，要請在亞洲的歐洲人都是和平的，退回我們的權利，那就像「與虎謀皮」一定是做不到的。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便要訴諸武力，再說到武力，日本老早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土耳其最近也有了很完備的武力，其他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廓爾喀各民族都是向來善戰的，我們中國人數有四萬萬，向來雖然愛和平，但是爲生死的關頭，也當然是要奮鬥的。當然有很大的武力。如果亞洲民族完全聯合起來，用這樣固有的武力，去和歐洲人講武，一定是百勝無敗的。……」見孫中山全集第四輯第二三五、六兩頁。這中日的兩位預言家幾十年前所說的話，到現在都成爲事實，試看日本自世界第一次大戰之後，得到充足武備的預備，證諸大東亞的戰爭，不到個多月就將太平洋英美艦隊消滅大半，佔領香港，馬來半島，婆羅洲，菲律賓各島，其實力早堪誇耀於世界。惟東亞前途尙遠，蘇聯虎視北方，印度人正在被英壓迫，實力雖稱十足，然絕不可不做萬全的預備，而需要中國軍隊的幫助。而且東亞建設，人人有責，希望得到平等待遇的中華民族必需與日協力，共同努力，否則人將以不等待我，我豈敢接受？所以中國目前須急速建設國軍，以期完成大業，何況英美資本帝國主義，剝削世界弱小民族已經有二百年的歷史，其實力未可輕視。尤以美洲集團，佔地理的特殊性，有物資之深淵，因此今後必須與以澈底的打擊，使永無再起的力量。這樣看來，軍事的同盟實在是可以成爲中日合作的第二個基礎。

第三、經濟的提攜 所謂「經濟提攜」的意思，就是說中日兩國都有廣大的資源，與豐富的物產，偉大的人力，前進的技術，所以若能互相提攜，那麼利益就非常之大，不過其中心原則，總不外是平等互惠。或以資本做補助，或以物產相交換，或以技術人才，機器工具作輔佐，必如是而東亞經濟的壁壘纔能夠強固，兩國經濟，也就發展了。前交通部長諸青來先生的廣播詞有說：「……國家之有貧富，亦猶個人之有貧富也，現社會中人民，既不免因貧富而發生摩擦，何怪乎國際亦因貧富而引起衝突也。其資源豐富者稱爲有的國家，其資源貧乏而稱爲沒有的國家。沒有的國家，固常患不足而必不平，即有的國家，亦何曾能知所止而不貧。於是貧者求富，富更欲富，焦思苦慮，鬥角勾心，籌謀所以奪取資源之道，必依和平競爭之自然法則，而惟以暴力爲能爭奪，即爲戰爭。實言之，原因雖多，但主要原因起於資源之爭奪，爭奪而訴之於暴力者戰爭是也。……」又說：「……吾於上文中既有論及有的國家與沒有的國家之分別，茲果進而論此。有無二字之含義，約有兩點，甲國所有的或爲乙國之所無。例如美國富有石油缺乏桐油，中國則有桐油而缺石油，於是將此之有餘，資彼之不足，將彼之有餘補此之不足，互爲資補，故名曰通。通有相互之意，決非片面之謂。蓋有非盡有，無非盡無，故有無兩字之意義，爲相對者而非絕對的也，此其一。設若甲國之所無，乙個所僅足自給者，甲國乃欲強奪乙國所僅足自給者而自利，此亦非通有無之常道。例如中國產米僅足自給，安有餘量可資他國，力不資而勉強行之者即語所謂從井救人，必致同盡，此理昭然，不待細論，此其二。若捨僅足自給者而外，則中日兩國，可以互通之資源，財力，數奚止什百

，日本爲東亞先進國家，其技術資本，足以助我建設新國者非淺，又我國爲物產較饒之國，其可以供給鄰邦之製造原料者亦非少，破除獨佔之例，保存雙方生存權，則所謂平等互惠者，方克實現矣。次述其利害之意義，有無相通之後，必成爲利害相共，利害相共，卽中日經濟提攜之真諦也。蓋事有獨利於中國而不利於日本，而日本必不能允，有獨利於日本，而不利於中國，而中國亦必不能忍受。其於中日兩國爲兩不利者，雖贖愚不爲，獨利與兩不利，形式雖殊，實則相去無幾，蓋利一方而害他方者，他方必不能平情，不能平則勢必不久，勢必不久則或行險以求微倖，今日戰事之起因，何嘗非此，迨夫戰爭一開，則兩不利矣。是以中日經濟合作，必以兩利爲原則，國與國如是，人與人亦莫不如是。……」這兩段話已經把經濟提攜成爲中日合作的基礎的理由闡發得非常的透澈了。

第四，文化的溝通 我們大概都知道在世界之上，卽使在政治經濟方面雖然說根本沒有什麼利害的衝突，但若兩個已經趨於極端的國家，要使他們立刻都能夠互相理解，這確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此若要使他們都能互相理解，其惟一有效的方法，便祇有希望雙方各去成見，虛心坦懷的互相研究。我們試看英國在一三三七年（元順帝至元三年）因法國王位的繼承問題和法國衝突開戰，一直遷延到一四五三年（明景宗景泰四年）雙方纔算罷兵，這卽是西洋史上有名的所謂「百年戰爭」，比起中日兩國六七十年來的「喧嘩不和」。一期間還來得長久一點，但是在真當大將未與德媾和以前，英法兩國爲應付德義起見竟弄得水乳交融，親密異常，這豈非昔人所夢想不到的一樁奇跡？老實的說，英國本爲個人主義的國家，而法國

却是家族主義的國族，所以幾百年以年，雙方都不能理解。到了前世紀末葉，纔有愛特蒙特台莫朗氏所著的「盎格羅薩克遜的伏起」那樣真摯而綿密的研究的書籍出現，因此雙方纔發了親善的關係。在英國方面，如郭斯氏 Edmon Gosse 所撰的論文，也承認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期間，英法思想上的關係，還是非常疏遠。一八三七年（乾隆二年）的等一回英法同盟，對於思想文藝上絲毫沒有影響，至於羅蘭 Renan 法朗士 A. France 諸人的思想能夠波及英國的評壇，那都是屬於最近幾十年來的事情。原來英國只將法國看做是一個不道德無仰仰的國度，法國也嘲笑英國是充滿着陰氣而且非常喜歡僞善的國家。到了近年因為文學的相互介紹，兩國的瞭解便漸漸增進，尤其是那些可以汗牛充棟的赤裸裸的描寫國民內部生活的小說，已經造成了許多英法人間互相默契的機會。這樣所以使自從上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英法兩國，和在政治上同樣的精神上也造成了「協商國」，這樣絕對不是倖倖得來的事，乃係在長時間內由無數的學者文人及思想家的努力而後始能收此奇效。英法兩國的情形如此，別的國家又何嘗不如此？試看美國人的崇拜法國，固然是從十八世紀的萊斐德將軍援助美國的獨立戰爭為起始，但那位精通英國歷史語言文字的法國駐美大使裘司朗氏 Jean Jusserand 的偉大功績尤為不可埋沒，因為他前後駐美十五六年，並且常常發表演說，又出版過幾部討論法美國交和歷史的論文集，所以他不僅造成了兩國國際間親善的關係，而且對於美國的人心也有極大的影響，上次美國參加歐戰，許多美國人就明白的說這是維持自由正義的美國為着要報答從前法國萊斐德將軍的恩惠，所以纔對德國以兵戎相見。此外如鄰邦日本，在四十四年以前，我國先覺

黃遵憲詩人即已不勝感慨的說：「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於外事不層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到了十八九年前戴天仇氏仍在大聲疾呼的說：「我們中國人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日本，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日本人都願意見，這真叫做「思想上的閉關自守，」「知識上的義和團一了？」試看別的國家對日本的制度又是怎麼樣呢？如法國在政治經濟學術技藝上對日本的關係上雖然比較的少，但法國却很能消化理解日本美術精神之足以誇耀於世界；德國也因為從來日本有許多學者到他國裏去，所以在智識階級之間，亦甚能認識日本文化的真價值。至於英國如阿斯頓氏 William George Aston 即首先用英文成一部最完全的「日本文學史」；薩托氏 Sir Ernestow 亦曾撰述許多論文，向世界宣傳日本的文化，有了很大的貢獻；李特司台爾氏（即弗里曼米德府特氏）所著的「古代日本的故事」Tales of Old Japan 一書並為文壇上的一部傑作，他的「回想錄」裏面又附錄着幾篇關於明治維新當時的日本印象，令人一讀此書，便都能感覺得到不是此人不能寫出這樣的筆致。按他們——英法德日——既非「同種」，更不是「同文」，尙可辦到這樣互相理解敬重的大步，奈何中國至今還不肯承認日本的文化自有其不可一筆抹殺，足資我們取法借鑒的特別優點存在？日本方面不幸近世亦有些陷於崇拜歎美的弊病，同時大半妄掉日本現在的與隆強盛，文物美備，其千餘年來所蒙中國的影響實為普遍鉅大。其實大家都應該知道中日兩國今後的能否「共存共榮」，即繫乎中國是否能澈底的瞭解日本？日本是否能夠澈底

的瞭解中國？此事的能否實現成功，亦即爲東亞永久和平能否樹立的惟一重大的關鍵。所以，文化的溝通，實在成爲中日合作的最重要的一個基礎了。

第五講 中日合作與東亞新秩序建設的前途

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提攜，文化溝通是中日合作的四大基礎，而其最終目的即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究竟什麼是「東亞新秩序」呢？我們知道自從五年前發生不幸的盧溝橋的事變以來，中日兩方，都同時有了反省，深感兩國關係實在有重新調整，東亞的秩序亦有重新建設的必要，於是日本言論界曾有過所謂「東亞協同體」的倡議，但我國的人士因爲這個名詞的含義不十分明瞭，所以就很少談及，後來又有一「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出現，詞意比較顯明，到了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三日近衛公爵特意廣播，說明日本的真意，不在中國滅亡的，而在中國的興隆，期望與中國分担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更發表聲明，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三大原則，於是便引起了中國方面關心東亞全局前途者的深切注意，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這口號，就不斷的加以探討，可是直到現在也還有一些人不是存着無謂的懷疑，便是加以冷淡的漠視。

他們爲什麼會有無謂的懷疑呢？這就是因爲他們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爲日本之所以提出這句口號，僅僅是變相的大陸政策或圖謀中日合併的一種掩飾，但是我們只要聽到板垣征四郎大將所說

：「使中國復歸於中國，日本復還於日本，東亞復歸於東亞。」的話，就自然而然的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目標，便有了一個比較明白的印象。假若我們再聽到西尾壽造大將所說：「中國替中國着想，也替日本着想，日本替日本着想，也替中國着想，兩國同替東亞着想，」的話，便不期然而然的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方法，有了一個更為積極具體的概念。到了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我們又讀到米內首相的聲明裏有這許多句的話，說：「使各國均得各安其所，近隣相攜」，「互相尊重國家民族的本性」，「互相警戒唯物赤化的侵襲」，以此「確立東亞之和平，建設互惠之經濟，長短相補，有無相適」，這樣使我們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內含，又有了一個確切堅定的認識，後來日本派遣軍總司令部發表「告將士書」的一本小冊子有說：「中國國權獨立之受威脅時，即東亞和平擾亂之濫觴，抑亦日本受人威脅也。日本存有剖分弱化中國，並操縱中國死命之思想者，非絕無其人，但此種思想，與歐美各國侵略中國之思想無異，斷非戰爭之目的。……中日善鄰之結合，須待日本堅固心志，不惜用全力幫助中國實現其統一，而且滿足其熱烈的民族之要求，始克成功。萬一日本人中，有欲欺瞞中國人，而望取得其不當之利益，或仿效外國人視中國為日本之殖民地，是違背日本遵守道義之本質，且終不能固守其俯仰無愧之信念也」。這樣，使我們對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精神，更增加了無限的期望，從此，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其意義便日益近於其體，日益趨於明顯，於是這些懷疑建設東亞新秩序這句口號的人，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但為數也二天半天的減少了。

不過現在也許還有一部份人士，以為建設新的東亞，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事，但是今日的中國，救死不遑，那裏還有閒工夫來談什麼東亞新秩序的建設呢？因此日本方面見得中國人這樣的漠不關心，便以為中國只知道求國家民族的獨立生存，而完全不知道其對於東亞所應共同分擔的責任，於是日本方面便責備中國人的要求過於近視，中國方面却也反相說，同樣的責備日本人的理想太不切實際。我們研究中日雙方所以如此的隔膜，就是因為彼此之間，還不曾相互理解，還沒曾得到共同的信念。所以宣傳部長就說過：「一個健全的國際新秩序的確立，必須以健全的構成分子為其基礎，反之，一個國家的獨立生存，亦必須以有力的國際秩序為之保障，如果彼此有了這一個共同的信念，則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所謂求國家民族的獨立生存，分而言之，是謀各自的獨立生存，合而言之，是謀共同的安全發展，正是相輔而成，沒有一點分歧。就日本言，要達到建設東亞新秩序之目的，就必須輔翼中國，俾中國遂其獨立生存，進而求發達繁榮。以分担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就中國言，要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生存，尤必須聯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彼此的出發點雖不盡同，而其途徑則是一致，其目的更是一致的。所以我們今日，在中國，必須明白認識建設東亞新秩序與中國的獨立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中國之獨立生存，必須於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中求之，在日本亦必先明白認識，中國的獨立生存與建設東亞新秩序，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東亞新秩序的建設，必須中國的獨立生存為其基石乃能確立。在中國必須使日本知道，中國的獨立生存，對於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不但無礙而且有利，在日本亦必須使中國知道東亞新秩序的建設，對於中國的獨立生存，不但無礙而且有利，然後彼此纔能夠互相理解，共同前進，」這話說的很為精當名貴！由此可見中日合作的最終目的即為東亞新秩序的建設是絲毫沒有疑義的了。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

中央陸軍將校訓練團印發

承印者 南京武學書局發行所

太平路北首二一六號
電話二二一五七號轉

4/1

